

# 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

刘志峰\*

## 目 录

1. 序言
2.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长安形象
3. 韩国历代长安形象的演变
  - 1) 统一新罗时期
  - 2) 高丽时期
  - 3) 朝鲜时期
4. 韩国汉诗“长安形象”的特点
  - 1) 受容性
  - 2) 偏离性
5. 结语

## 1. 序言

从韩半岛产生国家伊始就出现了汉诗，如《龟旨歌》、《公无渡河歌》，以及高句丽琉璃王的《黄鸟歌》，650年新罗真德女王为唐高宗献上了一首五言排律《太平诗》，收于《全唐诗》797卷，之后汉诗作为一种基本文学样式一直贯穿于新罗、高丽、朝鲜等历史时期。长安，自两汉定都以来，隋朝在汉长安城东南兴建新城改名大兴，唐政权建立后又将大兴改名为长安。此后数百年间，长安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上规模最宏大、经济最发达的国际都市闻名海内外。

引起笔者关注的是，韩国历代文人诗文总集《韩国文集丛刊》（共500辑）<sup>1)</sup>中，大量汉诗提及了“长安”，粗略检索后发现数量竟超过3,000首。韩国

\* 경희대학교 국어국문학과 박사과정.

汉诗中为何会出现长安？中韩“长安”有着怎样的关系？本文将借用比较文学形象学的理论，来对此进行探讨。

比较文学形象学 (imagology) 所涉的形象并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形象，而是指各国文学中所描写、塑造出来的“异国”形象，这种形象的产生于两个相关国家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有关<sup>2)</sup>。

## 2. 比较文学视野中的长安形象

长安做为汉唐之都，曾在汉代古诗、乐府诗以及唐诗作品中大量出现，之后宋元明清历代的诗词之中也有长安。如：如苏轼《沁园春（孤馆灯青）》中回忆仁宗时与苏辙汴京进士及第，有“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一句；南宋皇帝赵构见天降大雪担忧临安贫民说：“雪却甚好，但恐长安有贫者。”<sup>3)</sup>；元好问有诗《涌金亭示同游诸君》：“长安城头乌尾讹，并州少年夜枕戈。”；龚自珍《己亥杂诗》中有：“进退雍容史上难，忽收古泪出长安。”

综合来看中国诗词中出现的长安有三种含义：第一种是单纯地理意义上的，主要指汉唐长安城市所在地；第二种是政治意义上的，指国家的首都；第三种是文学意义上的，主要包括与长安相关的一系列典故及著名诗句，如“长安日”、“长安陌”、“长安不见使人愁”等等。

何谓长安形象？汉唐长安作为国都，特别是随着唐文化步入全盛，长安形象也达到了巅峰。“长安”成为了唐文化以及唐代社会、人文生活方式得以集中体现的舞台与载体。除韩国外，日本汉诗中当也有“长安”，如友山士德（1301-1370）有诗“举头咫尺长安近，大道无拘任往还。（题万年院）”；鄂隐慧龕（1357-1425）有诗“别来肝肺冷于铁，听尽长安半夜钟。（寒夜留

1) 具体参照“韩国古典综合DB”，<http://db.itkc.or.kr>。

2) 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第149页。

3) 周密撰，傅林祥注，《梦梁录·武林旧事》，山东友谊出版社，2001年，141页。

客)”等。很明显长安在东亚汉字文明圈各国的文学之中是广泛存在的，即使“长安”所指城市有所改变，但“长安”已经成为了一个能够引起东亚文明圈<sup>4)</sup>共鸣的人文符号。

长安形象是在东亚文明圈范围内，以汉唐长安为母体，衍生出的与其相关特定城市的景观、生活、市民、风俗等一系列文学形象，当中包含着人对城市文明向往的普遍情结。

以唐诗为例，李白“春潭琼草绿可折，西寄长安明月楼”，崔颢“长安甲第高人入，谁家居住霍将军”有关长安城市；杜甫“长安秋雨十日泥，我曹鞦马听晨鸡”，孟郊“乘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有关长安景色；李白的“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高适的“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杜甫的“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有关长安市民与风俗。长安形象描写现实的同时也被赋予了丰富的情感，依依惜别的长安陌，作客他乡的长安日，醉卧漳滨的长安梦，西出阳关的忆长安……这是一种向往美好城市的无意识冲动，是一种“长安情结”。李白“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杜甫“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月夜）”；王翰“夜听胡笳折杨柳，教人意气忆长安。（凉州词）”等等，莫不是长安情结最好的体现。屡试不第的书生、塞外沙场的将士、和亲外嫁的公主，避乱流落的文人……求长安而不得、居长安而远迁之人，长安安定、繁荣、美好的形象，让人回首，使人怅望，令人梦中频流连，教人意气忆长安。可以说，忆长安、望长安的“长安情结”之中，包含了人对美好城市的普遍向往，也有着人生无限的追问与迷惑。

法国学者让-马克·莫哈（Rang-Make Moha）曾指出形象学中的形象具有三重意义：“它是异国的形象，是出自一民族（社会、文化）的形象，最后，是由一个作家特殊感受所创造出的形象”<sup>5)</sup>。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4) (韩) 赵东一, 《东亚文明论》, 首尔: 지식산업사, 2010年, 第22页。赵东一将世界文明版图划分为几个主要的文明圈, 有: 东亚汉文儒教佛教文明圈, 南亚东南亚梵文印度教佛教文明圈, 西南亚北非东非阿拉伯语伊斯兰教文明圈, 欧洲拉丁语基督教文明圈等四大文明圈。

5) (法) 让-马克·莫哈著, 孟华译: 《试论文学形象的研究史及方法论(续)》, 《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2期。

(Daniel-Henri Pageaux) 则认为, 形象是“在文学化, 同时也是社会化的过程中得到的对异国认识的总和”<sup>6)</sup>。中国学者孟华也提出, 形象学属于国际文学关系研究的范畴, 它实际上探讨的是“一国文学如何塑造、描写异国形象”的问题<sup>7)</sup>。

“一切形象都源于对自我与他者, 本土与异域关系的自觉意识之中, 即使这种意识是十分微弱的。因此, 形象即为对两种类型文化现实间的差距所作的文学的或非文学的, 且能说明符指关系的表述”<sup>8)</sup>。这种“自觉意识”就是本土作家对自我与他者、本土与异域比较之后, 进行混合再创造的意识, 即便有时并非是有意为之, 所以通过研究“长安形象”, 最终可以揭示两种不同文化间的关系。

根据以上诸位提出的形象概念, 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具备了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条件: 首先, 对于韩国历代来讲, 长安原本是一个异国形象; 其次, 虽然长安形象并非韩国原创, 但在接受这一形象的漫长时间里, 新罗、高丽、朝鲜的整个文人阶层, 共同将这个“异国形象”与“本国形象”进行对比混合, 最终产生的“长安形象”能够反映韩国历代文人对中国长安的认识, 同时体现出了韩国历代的特点。最后, “长安形象”当中内含着一种古代中韩文学关系。因此, 比较研究中韩两国的“长安形象”, 可以增进对以下几方面的理解: 第一, 新罗、高丽、朝鲜汉诗中“长安”含义之嬗变; 第二, 通过“长安形象”的研究揭示中韩文化关系; 第三, 新罗、高丽、朝鲜汉诗中“长安形象”之特色。

6)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20页。

7) 孟华, 《为X与Y模式一辩》, 《中法文学关系研究》,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年, 第34页。

8)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 孟华译, 《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 第4期, 第79页。

### 3. 韩国历代长安形象的演变

#### 1) 统一新罗时期 (668~935)

统一新罗曾派遣了大批遣唐留学生，人数多达几百人，但作品存世的诗人只有：崔致远、朴龙范、崔承佑、崔匡裕几位，提及长安作品如下。当中提及长安的作品有：崔致远的《长安旅舍与于慎微》：“上国羁栖久，多惭万里人。那堪颜氏巷，得接孟家邻。”《春日邀知友不至》：“每忆长安旧苦辛，那堪虚掷故园春。今朝又负游山约，悔识尘中名利人。”《长安春》：“烟低紫陌千行柳，日暮朱楼一曲歌。”<sup>9)</sup>崔匡裕的《长安春日有感》：“麻衣难拂路歧尘，鬓改颜衰晓镜新。上国好花愁里艳，故国芳树梦中春。”

崔致远 (855~?) 十二岁咸通七年 (866) 赴唐留学，当时新罗的遣唐留学生多达数百名，但被后世所知的不过十几位。崔致远，字海夫，号孤云，十二岁赴唐求学，于唐僖宗乾符元年 (874) 宾贡科及第，三年后任宣州溧水县尉，唐僖宗光明元年至中和四年 (880~884) 于淮南任兵马都统高骈从事官，后于884年时返回新罗<sup>10)</sup>。传世有文集《桂苑笔耕集》、《孤云先生文集》，被后人称作“东国文宗”。崔致远在中国的16年中，其生涯大致可以分为前期在长安、洛阳求学、应试，后期在溧水、淮南 (今扬州) 为官。“前期虽曾在学习之暇写些诗文，但已失传，且无具体的行踪记录，无法确考其所到处。后期有不少诗文传世，其中涉及他所到过的一些地方”<sup>11)</sup>。虽然其在长安的行迹难以考证，但作为遣唐留学的新罗文人，其在长安生活过的事实是可以确定的。

朴龙范 (?~?)、崔承佑 (?~?)、崔匡裕 (?~?) 三位均为新罗时

9) 《长安春》原诗已不见，现存一联收录于日本平安时期大江维时所编《千载佳句》之中。引自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59页。

10) 李黄振，《崔致远出生年份及其及第年龄再考论》，《铜仁学院学报》第13卷第1期，2011年1月，第21~25页。

11) 韦旭升，《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延边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第4页。

期诗人，三人与崔致远同列“新罗十贤”，但他们的汉诗作品仅在《夹注名贤十抄诗》当中略有收录（每人10首）。朴龙范并未有作品直接提及长安，10首作品中7首为寄赠唐人之作，从其诗“千绪旅愁因感起，几茎霜发为贫生。堪知折桂心还畅，直到逢秋梦不惊。（《早秋书情》）”可知其在唐生活并不如意。崔承佑的生平在《三国史记》有简短记载：“唐昭宗龙纪二年（890）入唐，京福二年（893）侍郎杨涉下及第。”其10首作品多与唐人交游之作，当中未提及长安。崔匡裕则有题为《长安春日有感》的作品，应为在唐长安留学时所作。

从以上崔致远的“每忆长安旧苦辛，那堪虚掷故园春”，崔匡裕的“上国好花愁里艳，故国芳树梦中春”当中不难看出，新罗文人较少直接描写长安的形象，但却写出了外邦学子羁留唐都，寂寞求学的辛苦与烦闷，这与唐代诗人贾岛（779~843）倒颇有些相似，贾岛也曾有在长安生活多年应试科举，屡试不第的经历，“下第只空囊，如何在帝乡。杏园啼百舌，谁醉在花旁”，又是何等郁郁苦闷。“帝乡”也好，“上国”也罢，长安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压迫感，长安的种种美好对这些在异国、异乡苦读的文人来说，都已经变了滋味。

新罗汉诗中的长安是一种地理意义上的长安，新罗汉诗存世数量较少已经难以全面考察，但仍可以归纳出以下特点：一，诗中出现的“长安”均为唐代首都长安；二，创作诗人都有遣唐留学的经历；三，对于长安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存世作品多为酬和之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量作品散逸，另外也是由新罗文人在当时唐代社会的生存需要决定的。

新罗文人对长安的感情是复杂的，既感叹于长安的美丽繁荣，又被困窘生活及思乡之情所累，无心欣赏长安的繁华胜景。这种复杂心情与新罗诗人赴唐留学的目的，以及唐罗两国的关系密切相关。统一新罗建立之后，其国内实行的依旧是被称为“骨品制”的世袭制，这导致许多中层贵族子弟为了晋身权力高层得到重用，不得不赴唐留学考取功名，崔致远自己就是被称作“六头品”的中层贵族，其“先入唐留学，后回国为官”的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从国际关系角度来看，统一新罗是依靠唐的军事介入而建立起来的国家，新罗赴唐留学的文人难免会感到低人一等，这样的情绪也在长安汉诗当中自然流露了出来。

## 2) 高丽时期 (918~1392)

高丽光宗11年(960), 将开京(开城)命名为皇都, 因其附近有山名松岳山, 故民间又称其为松京、松都等。长安并非开京的官方称谓, 但高丽文人却在汉诗当中将开京称为“长安”。代表诗人主要有: 林椿、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穡、金九容等。

林椿(1148?~1186?), 生于高丽文臣之家屡试不第, 后在武人执政时期家道没落, 屡试不第, 曾为“竹林高会”七贤之一, 以文章闻名, 贫病交加, 39岁英年早逝, 早年居住开京(开京), 后辗转于尚州、襄阳等地, 未曾到过中国<sup>12)</sup>。高丽诗人当中, 林椿最早在汉诗中提及长安, 作品《谢人见访》是一首描写贫困生活的作品: “长安霖雨后, 思我远相过。寂寞蜗牛舍, 徘徊驷马车。恒饥穷子美, 非病老维摩。莫署吾门去, 声名恐更多。”开京雨后有朋友前来拜访, 诗人有感而发慨叹杜甫的穷苦与王维的终老, 当中的“长安”所指的应是高丽的首都开京。1174夏, 金甫当“毅宗复位运动”失败, 文臣再遭李义方等武将杀戮, 动荡的局势使林椿难以维持生计, 不得已离开了首都开京流落地方, 《仗剑行》正是表明了此时凄凉感慨的心情。当中一句: “长安尘土中, 高枕卧五载。恒饥已变颜色黧, 牢落枯肠千卷书”, 指的正是林椿之前五年开京生活的写照。

李奎报(1168~1241)是高丽中期被武人政权崔忠宪父子重用的文人, 是高丽新兴士大夫阶层的代表, 文学创作提倡“新意论”, 有诗2000余首, 其中涉及“长安”的作品很多。考其年谱, 李奎报并未到过中国, 但曾读过唐史, 于27岁(1194)时创作了《开元天宝咏史诗》43首, 当中一首《绿衣使者》诗前序为: “遗事曰长安富民杨崇义妻刘氏, 与邻人李奔通, 共杀崇义。有鸚鵡语曰, 杀者李奔也, 遂败。明皇闻之, 封为绿衣使者。”所说的正是《开元天宝逸事》中的“鸚鵡告事”<sup>13)</sup>, 此处长安显然是唐都长安。但在其他作品中, 长安所指的

12) (韩) 吕运弼, 《林椿生涯에 대한 再檢討》, 《韩国汉诗研究》第4号, 한국한시학회, 1996年, 第203~245页整理。

几乎都是高丽首都开京。李奎报29岁(1196)时,崔忠宪武人政权在开京发动政变,李奎报姐夫被发配黄骊县,他不得不带着姐姐离开开京避乱黄骊,后又前往尚州,后于该年10月又经黄骊回到开京<sup>14)</sup>。这一年他创作了《古律诗九十二首》,当中不乏怀念开京、渴望返回首都的作品,如“忆昔共游长安中。算来一十四春风。(是日入元兴寺见故人珪师赠之)”“初别长安陌,迁延客万里。(忆二儿)”“长安不是天难到,漳浦沉婴泥杀人。(忆长安)”“长安何日到,目断碧天涯。(旅舍有感,次古人韵)”“寄谢长安旧知己,客中双眼为谁青。(宿灊江村舍)”“穷秋客南国,今日向长安。(将发黄骊有作)”等。

以上各句不难看出离开首都的李奎报对开京的怀念,诗中所言“长安”即是开京。《古律诗九十二首》当中还有一首题为《南窗熟睡梦到长安觉而志之》:“南窗半日偷睡,梦到洛阳城市。觉来犹卧一床,已度千山万水。”虽然题目中用长安借指开京,诗中又用“洛阳城市”来替换,可见长安也好,洛阳也罢,都是用唐代的東西二都比作高丽的首都开京。

另据李奎报年谱,李奎报32岁(1199),“夏六月,颁政,补全州牧司录兼掌书记。九月,赴全州……”此年李奎报有诗题为《九月十三日发长安将赴全州临津江船上与晋公度韩韶相别》;李奎报34岁(1201),“春正月,至自广州,夏四月,之竹州迎母至京师”,此年有诗题为《自竹州舁母携姊将赴长安示甥璿郑生柔》<sup>15)</sup>。可见“长安”就是开京。

李齐贤(1287~1367)生活在高丽被元朝支配时期,15岁高丽成均试及第,曾四任宰相,一生七次赴元,前后逗留时间长达12年。28岁(1314)时,应居留在元大都的忠宣王之召以内府副令的身份第一次到北京,于万卷堂结识元明善、赵孟頫等元朝名士。之后李齐贤于1316年还曾陪同忠宣王前往峨眉山祭拜<sup>16)</sup>,中途经过长安,作词《木兰花慢·长安怀古》;1319年陪同忠宣王到

13) (五代)王仁裕撰,丁如明辑校,《开元天宝遗事十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71页。

14) (韩)朴宗基,《李奎报의 生涯와 著述 傾向》,《한국학논총》19卷,국민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1997年,第40页。

15) (韩)朴性奎,《李奎报 年谱 研究(2)》,《漢文教育研究》第24号,한국한문교육학회,2005年,第262页。

过普陀山，1320年忠宣王被贬谪李齐贤又到大都，1321年李齐贤父去世，他返回高丽，之后由于1322年回到大都，1323年离开大都前往甘肃临洮探望被贬的忠宣王，二次途经长安做过题为《题长安逆旅》的五律一首、七律三首<sup>17)</sup>。其中五律为：“车马函关道，风尘季子裘。辙环天下半，心逐水东流。万事唯呼酒，千山独倚楼。青云有知己，未用叹悠悠。”这题诗应是李齐贤去往临洮途经长安，写在长安旅店之中的感怀。诗中并未涉及长安的形象，但“函关道”、“季子裘”<sup>18)</sup>已经道明了所处关中、旅途劳顿，想必是借在长安短暂休整的时候创作的，倾吐了故国之思、羁旅之苦，慨叹国家之难、宦路之艰。由李齐贤的经历可以知道此处的长安指的是元代的长安城。

李谷（1298~1351）是高丽后期的著名文人，36岁（1333）参加元朝会试及第，之后多次作为使臣往返于高丽和元之间，他的作品涉及长安的有《同禁内诸生游紫霞洞次韵》：“长安万家无所适，肯向高门低我颜”，紫霞洞是开京附近松岳山的一处名胜<sup>19)</sup>，此诗当中所言“长安”正是开京。

李谷之子李穡（1328~1396）也是高丽末期的大儒，他的许多门生成为了朝鲜时代的开国功臣。李穡有诗4118题，近6000首；21岁随父亲到元大都，入元国子监学习；24岁父亲去世返回高丽服丧；27岁获元殿试次席，被任命为国史院编修官；29岁时返回高丽任吏部侍郎，后屡获重用40岁之后历任高丽成均馆大司成、政堂文学等；62岁时因与曹敏修拥立恭愍王之子昌王即位被李成桂势力打压，后被流放，69岁去世<sup>20)</sup>。李穡曾在元大都学习，明洪武21年（1388）也曾作为高丽贺正使出使明都南京，但没有其到过长安的记载。提及“长安”的

16) (高丽)李齐贤，《栢翁稗说》后集卷1，“延祐丙辰，予奉使祠峨眉山。道赵魏周秦之地，抵岐山之南，逾大散关，过褒城驿，登栈道、入剑门，以至成都。又舟行七日，方到所谓峨眉山者。”

17) 柳己洙，《李齐贤及其词之研究》，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1年，第4~23页整理。

18) 战国纵横家苏秦，字季子，《战国策》卷3中有“黑貂之裘弊，黄金百斤尽”语，指苏秦入秦求仕，资用耗尽而归之事。后用季子裘比喻路途处境困顿。

19) 参照(韩)《古典翻译丛书·简易集》卷七，《松都录·次韵药圃老兄韵通七首》“紫霞洞”注释。

20) (韩)金镇英，金东健，《牧隱 李穡의 삶과 시세계의 몇 국면》，《国语国文学》150辑，국어국문학회，2008年，第240~242页。

李穡汉诗主要有：“春风匹马帽檐斜，看尽长安千万家。（又用前韵）”“长安乐事久牢落。赖是少陵初写真。（三月三日）”“四序迭行无断绝。更教春色满长安。（寿权开京）”“燕舞莺歌春日好。俯看桃李满长安。（纪事）”“长安会稽两寂寞。诗篇笔阵空留名。（踏青歌一首）”“长安风雪惨愁容。独有南京花气浓。（纪事三首）”

以上各句当中的“长安”都是开京，特别是在1388年李穡出使南京前后创作的《纪事三首》当中“长安”与“南京”所指的就是高丽和明。1388年2月明向高丽明确要求归还元曾占领的铁岭卫以北的辽东土地，5月高丽禑王派李成桂、曹敏修进兵辽东，李曹二人密谋之后出兵并未到达辽东，而是率兵返回开京发动政变，后废掉禑王，改立恭让王。在这样的背景下，李穡出使刚刚建立20载的大明，所见所闻一派蒸蒸日上，回想此时内乱争夺白热化的高丽，心中不免黯然。

金九容（1338~1384），高丽进士及第，曾与李崇仁、郑道传一起反对高丽与北元的外交往来，后升任成均馆大司成、判典校寺事等官职。金九容曾两次出使中国，分别是1372年8月~1373年7月，作为圣节使成元揆的书状官，另一次是1384年作为行礼使出使辽东。第二次出使时因外交摩擦事件<sup>21)</sup>，被押送至明首都南京，后被明太祖治罪发配云南大理卫，途经四川泸州永宁时不幸去世。金九容的长安汉诗主要有：“寂寥西望向长安，落日孤云极目寒。（寄李判官）”“饮尽长安百万家，满城桃李一时花。（呈权右尹其二）”“饮酒长安兴更长，何须苦恨过年光。（醉中）”从其文集《惕若斋行吟集》上下卷所收诗作的先后顺序可知，《寄李判官》与《呈权右尹》应该作于1361~1368年，此时金九容任先后任证言、献纳、点校副令，《醉中》应是作于1375~1381年金九容被贬竹州、驪州时期<sup>22)</sup>。这两段时期金九容并未出使中国，其诗中所说的“长

21) 关于此事件未有定论。据《高丽史·列传·金方庆》记载，当时辽东总兵潘敬和叶望指责金九容曾与辽东道指挥梅义私下往来，将其发配；据《惕若斋行吟集·先君惕若斋世系行事要略》记载，辽东都指挥司事指责金九容献贡马迟缓，被发配大理；另据朝鲜徐筠《惺叟诗话》十八条，因金九容所献咨文误将五十四贡马数量误写作五千匹，被明太祖治罪发配云南。

22) (韩)成范重，《惕若齋 金九容의 文學世界》，蔚山：울산대학교출판부,1998年，第

安”即是开京，《呈权右尹其一》中还提到了高丽开京附近的名山鹤岭（即松岳山）和龙岫山。

以上，高丽时期汉诗中的“长安”与新罗时期相比，其含义发生了变化。林椿、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穡、金九容等都是高丽汉诗史上具有代表性的诗人，他们创作的长安汉诗当中，除李齐贤的《题长安逆旅》是作于元代长安以外，其余作品所指都是高丽首都开京。

虽然高丽文人熟知长安是汉唐之都，但却在汉诗中称高丽首都为“长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根据笔者的考察，最早将开京称为“长安”的应是诗人林椿。从高丽918年建国至林椿生活的年代（1148?~1186?），相距200余年，为什么在林椿之前类似的用法鲜少见到呢？当然由于高丽前期文人文集传世较少，高丽前期是否存在这种用法有待进一步考证，但笔者认为高丽中后期文化的发展和北宋（960~1127）的灭亡与此也有很深的关联。

北宋建立之后，962年高丽向宋派遣使节，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之后由于辽对高丽的多次侵略导致往来中断，后于高丽文宗时期（1071）再次恢复了外交关系。1127年“靖康之变”，北宋被金所灭，高丽也转面向金称臣。北宋与高丽的政治外交虽然断断续续，但是民间的经贸往来一直十分活跃。除贸易外，高丽还大量搜集购买北宋书籍，积极接受中华文化。

在文化方面，高丽取得了长足发展，文人文章水平颇高，当中代表就是高丽文宗时的朴寅亮（?~1096）。朴寅亮曾于1071年、1080年两次出使中国，初次出使时曾作《泗州龟山寺》名噪一时，宋人赞其诗“尤精”<sup>23)</sup>；二次出使宋人惊叹于朴寅亮和与其同行的金覲（?~?）所撰写的尺牍、表状、题咏等，将这些文章整理成《小华集》刊印发行<sup>24)</sup>，可惜未能传世。有感于高丽崇尚汉

160~161页。

23) (宋)王辟之著，《澠水燕谈录》卷9，“高丽海外诸夷中，最好儒学……使臣御事民官侍郎金第，与同行朴寅亮诗尤精，如泗州龟山寺云，‘门前客棹洪波急，竹下僧棋白日闲’等句，中士人亦称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78页。

24) 《高丽史》卷95，《朴寅亮列传》：“寅亮……转礼部侍郎，（文宗）三十四年，与户部尚书柳洪，奉使如宋。……有金覲者，亦在是行。宋人见寅亮及覲所著尺牍、表状、题咏，称叹不置，至刊二人诗文，号小华集。”

文，使节文章功底深厚，宋神宗每赐高丽诏书，甚至都会格外谨慎委托给有实力的词臣，唯恐文章不够优秀有失国体<sup>25)</sup>，高丽文人实力可见一斑。宋人能够为高丽人朴寅亮出版文集，本身就是对其文章能力的肯定，同时，将朴寅亮与金覲的文集命名为“小华集”，也是对高丽文化文明程度仅次于中华的一种认可。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高丽对于自身文化的自信日益高涨。不过，从当时的国际形势客观来讲，宋与高丽都饱受北方民族国家辽和金的侵扰，难以进行军事力量的对抗，只能强化“华夷观念”，标榜自己文化实力的优势<sup>26)</sup>。正是在这个时期，北宋被金所灭，高丽不得已向金称臣。即便如此，在文化方面，高丽依然保持了原来北宋的立场，并强化了自己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认识。这种自信同样体现在了汉诗创作当中，用唐代首都长安来称呼高丽皇都开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种情况在之前很少见到，但当北宋灭亡之后，这种用法逐渐增多，于是便有了我们以上考察的诸多高丽诗人的“长安汉诗”。可以说，高丽长安汉诗的创作源于北宋灭亡后，高丽对于自身中华文化实力的自信。

这一时期“长安汉诗”的创作主体已从留学文人变为当朝官吏，涉及地理、政治、文学等长安的多方面含义。与新罗遣唐留文人对长安的复杂情感相比，高丽诗人已经不满足于瞻望，而是亲自将“长安”移入了高丽首都开京，完成了将“长安形象”由异国变为本国的过程。高丽文人在原有中国唐宋诗长安主题基础上，加入了高丽诗人各自的生命体验，充实了作为文学形象的“长安”，也使“长安形象”不再囿于中国，成为了一个国际文学形象。

### 3) 朝鲜时期 (1392~1910)

朝鲜建国后，太祖李成桂于1394年迁都汉阳（首尔），韩国汉诗中的“长

25) 《宋史》卷487, 《高丽列传》：“九年，复遣崔思训来……帝以其国尚文，每赐书诏，必选词臣著撰，而则其善者。”

26) (韩) 郑埜谟, 《北宋使行을 통해서 본 朴寅亮의 문학사적 위상》, 《韓國漢文學研究》第46輯, 한국한문학회, 2010年12月, 第51页, 93) 脚注整理。

安”含义再次发生了变化。但是朝鲜对于本国文化的认识基本上继承了高丽的“小中华认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东人认识”。朝鲜成宗9年（1478）徐居正（1420~1488）按照《文选》体例编撰《东文选》，强调东人之文并非汉唐宋元之文，可见朝鲜对于本国文章的自信与自主精神<sup>27)</sup>。

朝鲜汉诗中的长安汉诗数量远远大于之前两代，在3,000余首的长安汉诗作品中，统一新罗、高丽不及百首，余下全为朝鲜时期创作。数量剧增的原因除了朝鲜王朝统治时间较长、资料存留较多等原因以外，与朝鲜中后期开始崇尚唐诗有关。

朝鲜文人金宗直（1431~1492）曾对朝鲜前期以前历代诗风有过总结。“宗直自学以来，往往得吾东人诗而读之，名家者，不啻数百，而其格律无虑三变，罗季及丽初，专习晚唐，丽之中叶，专学东坡，迨其叔世，益斋诸公，稍变旧习，裁以雅正，以迄于盛朝之文明，犹循其轨辙焉。<sup>28)</sup>”这一论议被后世普遍认同，即新罗到高丽初期，为晚唐诗风；高丽中期开始宋诗兴起，至李齐贤开始稍作改良，但诗风发展到朝鲜前期整体仍然依照之前的发展轨迹。之后，随着明七子倡导“文笔秦汉，诗必盛唐”的复古之风，明人高棅（1350~1423）所著《唐诗品汇》对620余位唐诗人及5,700余首作品进行了评论，并划分了“七体九品”，将李白评为“正宗”，杜甫为“大家”，这一诗论对朝鲜汉诗理论影响深远，唐诗风开始得到扩大发展<sup>29)</sup>。到了朝鲜中期宣祖（1567~1608）时，诗坛出现了新变化，“三唐派”诗人崔庆昌、白光勋、李达，以及林悌、车天辂、李晬光等人在诗风从宋风转为唐风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碍于篇幅，举例主要诗人作品如下。

诗人	诗题	“长安”诗句
申叔舟	答寄平安金监司谦光	春去长安市，莺啼棠树林。

27) (韩) 郑埜谟, 《고려 중기 東人意識의 형성과 詩文選集의 편찬》, 《東洋漢文學研究》第36輯, 동양한문학회, 2013年2月, 第240页。

28) (朝鲜) 金宗直, 《青丘风雅·序》, 韩国首尔: 以會文化社, 2000年。

29) (韩) 金甲起, 《詩品格論으로서의 正宗·大家論》, 《한국문학연구》第34輯, 동국대학교 한국문학연구소, 2008年, 第295~297页。

徐居正	雪后有兴，题寄太初德与两集贤	长安城中三日雪，小片如手大如席。
	雨中，寄一菴、万德两上人	长安六月雨浪浪，平地水深三尺强。
金宗直	恭和御制狎鸥亭诗八首之二	长安咫尺何劳望，李白当年枉自愁。
金时习	登山顶，西望长安，仍念昔游三首之一	长安日下重回首，那个男儿不丈夫。
成倪	在铁原，逢端午	遥想长安千树底，几人撩乱竞秋千。
李彦迪	舟中即景	抬头渐喜长安近，三角峥嵘五云边。
郑士龙	寒食感怀，用祁皇华韵	直北长安遥万里。鱼书阻绝意茫然。
宋纯	己丑十月，自南乡投宿广程驿	长安渐近乡矣远，回望青山隔白云。
李滉	获郑子中书，知游清凉见忆，奉呈二绝	今岁鸥盟叹已寒，坐看红叶满长安。
郑澈	邻友昨夜，游赏白岳雪景，醉而未赴	三更雪月山头簌，百万长安尽起眠。
白光勋	送灵岩李使君鹏罢归	唯应千里梦，相送到长安。
李达	上巳	长安宫阙雨新晴，杨柳如烟拂绮城。
林梯	夜泊骊江	青袍更向长安去。八九违心竟孰逢。
车天谔	雨中有怀芝峰词伯	伏雨长安十日泥，那堪委巷隔轮蹄。
李晬光	雪后赴阙即事	五云宫阙羸层霄，雪满长安富贵宵。
申钦	赠明远二首之二	昨见长安使，来传舍弟书。
许筠	小桃	二月长安未觉春，墙头忽有小桃颦。
权禔	送丁内翰希稷还朝	暂守竹书留下邑，却随春色向长安。
金尚宪	元日早朝	长安门阙大明宫，北折天街更向东。
郑斗卿	望三角	削成千仞镇长安，气势雄雄龙虎盘。
南龙翼	骊江归路，登南汉新城	试看云起处，佳气是长安。
丁若镛	夜泊松陵有怀故人	抱朴已甘居委巷，献书方悔到长安。

从以上作品可知，诗中“长安”正是朝鲜首都汉阳。如徐居正的《雪后有兴，题寄太初德与两集贤》与《雨中，寄一菴、万德两上人》都是在雪后、雨后创作的，虽然徐居正在1460年任吏曹参议时曾作为谢恩使到过明朝，但诗的内容来看，显然不是出使时所作，当中所说的“长安”就是其居住的汉阳。金宗直在《恭和御制狎鸥亭诗八首之二》中更是用“长安咫尺何劳望”来调侃李白的“总为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意指身在狎鸥亭，无需远眺长安近在咫尺。诗中所说的狎鸥亭位于汉阳城南，即今天韩国首尔市江南区。可见，金宗直十分清楚汉阳并非唐之长安，只是按照当时的惯例而已。再如李彦迪《舟中即景》中“抬头渐喜长安近，三角峥嵘五云边”，诗中的“三角”指的是位于汉阳正北的三角山<sup>30)</sup>，可见“长安”正是汉阳，其余诗例不再一一赘述。

不过在朝鲜汉诗中“长安”并非仅指汉阳，有时也指平壤。如李晔光的《即事》：“游人白马长安市，美女青楼沮水桥。”这首诗注当中写明“长安，平壤别名”。沮水是流经今天北韩平壤的清川江和大同江的古称。再如，李安讷的《平壤月夜，酬赠西潭李达学官》：“樽酒长安一见面，兵戈流落十经春。”此诗题已写明会面与平壤。实际上，平壤城被称作“长安”在《北史》中已有记载<sup>31)</sup>，只不过是高句丽统治平壤的时期<sup>32)</sup>。如此看来，虽然在朝鲜汉诗中“长安”多数都是汉阳，但也有一些沿用了古时平壤的别名，用长安代指平壤。

这一时期除用长安指代汉阳这一变化之外，作品规模更大，诗人数量更多，表现手法更为纯熟，诗中长安大多是指代首都，或者源于文学典故，是对高丽“长安形象”的进一步发展。

#### 4. 韩国汉诗“长安形象”的特点

形象学中的形象普遍都会具有三个特征，即：被动性、程式化、偏离性<sup>33)</sup>。

被动性是指，形象创造的过程就是由“自我”固定的文化态度去想象、虚构“他者”，因此，形象多是按照自我文化观念的模型去塑造的，它可能与现实中的“他者”相似，也可能相去甚远，这是因为“自我”的主观文化思想在起着主导作用，而体现“他者”的“形象”只能被动地接受强大的“自我”主观文化思想的改造。程式化指，形象被创造出来以后，就会形成一种模式，逐渐固定下来，逐渐趋

30) 三角山为北汉山的中心，有三座名为白云台、人寿峰、万镜台的山峰，形似三只角而得名，位于首尔正北。

31) 《北史》卷94，《列传第八十二·高丽 百济 新罗 勿吉 奚 契丹 室韦 豆莫娄 地豆干 乌洛侯 流求 倭主》：“其王好修宫室，都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沮水。”

32) 苗威，《高句丽“平壤城”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6卷第2辑，2011年4月，第129页。

33) 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著作同前，第150~151页。

向于成为一个定型化的形象。偏离性指，由于“形象学所研究的形象，并非现实的复制品或相似物，它是按照注视者（形象的塑造者）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这些模式和程序先存于形象”<sup>34)</sup>，因此必然会带有某种误解的可能，导致客观上偏离现实中“他者形象”的真实存在。

可以说韩国汉诗中“长安形象”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上述特征，但也存在着一些特殊性。总体来看，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体现出了受容性和偏离性两大特点。

### 1) 受容性

韩国汉诗“长安形象”特征中的被动性并不明显。更多的是对中国“长安形象”的受容和再创造。如前所说长安有地理、政治、文学等含义，韩国汉诗主要接受的是后两种，即用长安借指首都，以及接受已经形成的文学典故。这可以理解为在场的“自我”文化观念并未起到主导作用，而是接受了不在场的“他者（唐代诗人）”所创造的长安形象和表达方式。因此长安形象的“被动性”与“程式化”可以概括为受容性。当然，受容并不代表雷同，当中也有创造。不妨以李奎报诗中的长安典故为例。

初别长安陌，迁延客万里。——《忆二儿》  
 握手长安路，潜然涕自零。——《路上逢故人口号》  
 白云居士今已衰，羞逐长安轻薄儿。——《留醉闲判官光孝家》  
 长安豪侠家，珠贝堆如阜。——《闻国令禁农饷清酒白饭》

以上诗句当中的长安典故有：“长安陌”、“长安路”、“长安轻薄儿”等典故在唐诗中早有出现，但“长安豪侠”实属李奎报所创，类似典故如“长安少年”、“长安游侠”等在唐诗中已有先例如下表。

34) 陈惇，刘象愚等，《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第196~197页。

典故	诗人	诗题	诗句
长安陌	韦应物	酒肆行	豪家沽酒长安陌，一旦起楼高百尺。
	李白	峨眉山人月歌，送蜀僧晏入中京	峨眉山人月还送君，风吹西到长安陌。
	刘禹锡	杨柳枝词九首	长安陌上无穷树，唯有垂杨管别离。
长安路	刘长卿	避地江东，留别淮南使院诸公	长安路绝鸟飞通，万里孤云西复东。
	顾况	寄秘书包监	一别长安路几千，遥知旧日主人怜。
长安轻薄儿	贾至	春思二首	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杀长安轻薄儿。
长安少年	王翰	相和歌辞·饮马长城窟行	长安少年无远图，一生惟羨执金吾。
	王维	横吹曲辞·陇头吟	长安少年游侠客，夜上戍楼看太白。

韩国汉诗当中这种类似的与“长安形象”相关的大致可分为：与长安城市相关、与长安景物相关、与长安阶层（贵族游侠）相关、长安情结等几类。这些分类的长安典故共同构成了“长安形象”，由于涉及作品数量众多，有待进一步整理分析，现将各分类典故罗列下表。

典故分类	名称	备注
长安城市	长安市、长安陌、长安道、长安路、长安街、长安甲第、长安百万家、长安万井烟、长安万户等	“长安陌”、“长安道”等，因多是送别之地，多在送别诗中出现；长安百万家等，多用于凸显长安城市规模之宏大。
长安景物	长安日、长安月、长安花、长安柳、长安春等	此类别多与长安自然景色相关。
贵族游侠	长安游侠、长安少年、长安侠客、长安豪侠、长安轻薄子、长安繁华子等	此类别中包含游侠之士和贵族少年双重含义，韩国汉诗特别是挽诗中经常出现。
长安情结	忆长安、望长安、长安回首、长安梦等	思念、追忆、留恋、无奈、遗憾等多种情感冲动，普遍地体现出人对城市的向往。

## 2) 偏离性

韩国汉诗“长安形象”并非现实的中国长安形象的复制品，它是按照韩国历

代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一种幻象，正如我们所知，并非所有的韩国诗人都到过中国，因此必然会带有某种误解的可能，导致客观上偏离现实中“中国长安”的真实存在。同时，由于长安形象已被高丽、朝鲜诗人接受为北国形象，这意味着韩国的长安形象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开京、汉阳的形象。比较文学形象学注重对于形象“主体”以及文本内部的研究，通过对韩国汉诗中“长安形象”的文本内部分析，找到能够反映这些汉诗被创作当时诗人以及社会情况的线索。高丽、朝鲜汉诗中的“长安形象”必然会反映高丽、朝鲜社会文化的现实。因此既可以把这种特征称为“偏离性”，也可以将其看做是韩国汉诗“长安形象”的特点所在。

这种具有“偏离性”的长安形象，在以各种节日为主题的长安汉诗当中最为明显。因为节日风俗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惯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即便东亚各国的传统节日日期、名称近似，但风俗却不尽相同，而这种节日风俗作为“长安”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也包含在长安形象之中。具体汉诗举例如：李湜“十里长安道，卖痴人竞呼。朝颁新玉历，门换旧桃符。邻竹三更爆，乡雉数队驱。病夫惊老大，最后饮屠苏。（元日）”；金昌翁“今夜少年金凤曲，谁人先踏锦川桥。（上元夜终南独眺）”；金履坤“寒雨滴滴广通桥，桥上桥下人如雾。（上元雨）”；李湜“寒食风光似旧时，花枝苔蕾草如丝。长安万户炊烟断，禁火应怜介子推。（寒食寄次韶二绝）”；南龙翼“长安一雨洗新秋，梦入清江江上洲。骚人有感木叶落，牛女相逢天汉流。（七夕夜会走笔应呼）”；具莹“长安秋夕意如何，独坐茅檐鬓欲华。遥想阿咸扫墓地，满山松柏夕阳多。（秋夕）”；李种学“快晴更欲登高去，回望长安倒一樽。（九日）”；柳方善“至日矣门独自眠，客中身世正堪怜。（至日自赋二首）”等。

韩国汉诗中提及了元日、上元、上巳、寒食、清明、端阳、七夕、秋夕、重阳、腊日、至日等古时重要节日，当中许多风俗与中国类似，如元日祭祀、上元踏桥、上巳沐浴、寒食戒火、七夕乞巧、秋夕赏月、重阳登高、至日闭户等，但除此以外高丽、朝鲜时期也有一些特有的风俗，这也风俗也体现在长安汉诗之中。这些风俗虽然偏离了中国长安的风俗，却成为了韩国长安形象的特

色。如元日为儿童穿上五色彩衣，这一习俗一直保留到了今天。五色彩衣源于朝鲜人对阴阳五行的理解，他们用五种颜色的布料代表五行，裁成儿童穿着的长袍和上衣，用以辟邪，保佑子嗣平安<sup>35)</sup>。李安讷(1571-1637)的“五色斑衣稚子舞，磨云岭外即长安。(甲辰元日时伯兄氏奉慈侍，来自孟山，仍留于郡)”一句中说的“五色斑衣”指的就是五彩衣。上元踏桥也是正月十五的重要风俗，从唐代开始上元已有“走桥”习俗，走桥本身有祈子的生殖意味，走桥习俗的奉行者一般为女子，一直延续至明清<sup>36)</sup>。金昌翁(1653-1722)、金履坤(1712-1774)的长安汉诗中就有汉阳上元节“踏桥”的内容，只是诗中提到的“锦川桥”和“广通桥”是分别位于汉阳昌德宫进善门外禁川和汉阳广通坊的石桥。风俗虽然相同，但长安形象当中已经加入了异国的元素。

北宋张先曾在《木兰花·乙卯吴兴寒食》中写道：“龙头舴艋吴儿竞，笋柱秋千游女并”，可见当时已有寒食女子荡秋千的风俗。但在朝鲜长安汉诗中，除了寒食、清明以外，端午节也是女子荡秋千的重要节日，成倪《在铁原逢端午》中描绘的“遥想长安千树底，几人撩乱竞秋千。”的场景何尝不是另一种韵味长安呢。灯夕观灯也是朝鲜长安的一种独特风俗，高丽武将崔瑀掌权时(1221-1249)，将正月燃灯的风俗改为阴历四月初八，所以高丽、朝鲜便有了“灯夕”这个节日，而中国没有灯夕的记载。这一风俗在长安汉诗当中多有提及，李景奭(1595-1671)《灯夕抒怀》中有“长安旧俗重观灯，不于上元于四月”句。随着长安被朝鲜诗人接受，这些与中国相异的风俗也自然地成为了长安形象的一部分。

## 5. 结语

35) (韩) 朴宣映, 《세시복식(歲時服飾)의 의미와 상징에 관한 연구》, (韩国)中央大学大学院衣类学科韩国服饰专攻博士学位论文, 2012年2月, 第111页内容整理。

36) 杨琳, 《中国传统节日文化》, 北京: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0年6月, 第83~84页整理。

以上，本文对检索得到的3,000余首韩国“长安汉诗（内容涉及长安的汉诗）”进行了考察，结合中国唐诗中的长安形象，笔者提出了“长安形象”的概念，即，长安形象是在东亚文明圈范围内，以汉唐长安为母体，衍生出的与其相关特定城市的景观、生活、市民、风俗等一系列文学形象，当中包含着人对城市文明向往的普遍情结。

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具备了作为比较文学研究对象的基本条件：首先，对于韩国历代来讲，长安原本是一个异国形象；其次，虽然长安形象并非韩国原创，但在接受这一形象的漫长时间里，新罗、高丽、朝鲜的整个文人阶层，共同将这个“异国形象”与“本国形象”进行对比混合，最终产生的“长安形象”能够反映韩国历代文人对中国长安的认识，同时体现出了韩国历代的特点。最后，“长安形象”当中内含着一种古代中韩文学关系。

参照中国长安地理、政治、文学三方面的含义，本文考察了统一新罗、高丽、朝鲜汉诗中的长安含义及长安形象。

统一新罗时期的长安汉诗作品并不多，主要有曾留学唐朝的崔致远、崔匡裕创作的《长安旅舍与于慎微长官接邻》、《长安春日有感》等作品，新罗长安汉诗中的“长安”指的是唐代首都长安。这一时期长安汉诗对长安的直接描写着墨不多，存世作品多为酬和之作，这一方面是由于大量作品散逸，另外也是由新罗文人在当时唐代社会的生存需要决定的。

高丽时期长安汉诗诗人主要有：林椿、李奎报、李齐贤、李谷、李穡、金九容等，据考察除李齐贤以外，其余诗人均未到过中国，大部分高丽汉诗中的“长安”所指的已经不是中国的长安，而是高丽首都开京。笔者认为发生这种变化的原因主要是由于高丽文化发展和北宋的灭亡。虽然高丽向金称臣。但在文化方面，高丽依然保持了原来北宋的立场，并强化了自己作为“中华文化继承者”的认识。这种自信同样体现在汉诗创作当中，用唐代首都长安来称呼高丽首都开京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朝鲜时期长安汉诗中出现的“长安”大多数情况下是指朝鲜首都汉阳，这一时期作品数量大增，有2,800余首之多。其原因除了朝鲜王朝统治时间较长、资

料存留较多以外，与朝鲜中后期汉诗创作崇尚唐诗有关。几乎所有朝鲜时期的著名文人、诗人都创作过长安汉诗。朝鲜长安汉诗可以看作是在数量和质量上对高丽长安汉诗的继承和发扬。

形象学中的形象普遍都会具有三个特征，即：被动性、程式化、偏离性。但从总体来看，韩国汉诗中的“长安形象”体现出了受容性和偏离性两大特点。

受容性指，韩国汉诗的“长安形象”多数都是对中国“长安形象”的一种受容和再创造，主要表现在将首都称为长安，以及借用中国长安文学典故等方面。这可以理解为在场的“自我”文化观念并未起到主导作用，更多的是接受了不在场的来自“他者（中国唐代诗人）”所创造的长安形象和表达方式，主要体现在对唐诗中词汇、诗句典故的活用方面。笔者将韩国汉诗中出现的典故分为：长安城市相关、长安景物相关、贵族游侠相关、长安情结相关等几类，留待今后深入研究。

偏离性指，由于韩国汉诗“长安形象”并非现实的中国长安形象的复制品，它是按照韩国历代文化中的模式、程序而重组重写的，因此必然会带有某种误解的可能，导致客观上偏离现实中“中国长安”的真实存在。同时，由于长安形象已被高丽、朝鲜诗人接受为本国形象，这意味着韩国的长安形象更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开京、汉阳的形象。因此既可以把这种特征称为“偏离性”，也可以将其看做是韩国汉诗“长安形象”的特点所在。这种具有“偏离性”的长安形象，主要体现在对各种节日风俗的描写之中，因为节日风俗最能够体现一个民族惯有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韩国长安汉诗中体现出的民俗有：元日换桃符和给儿童穿着五彩衣；上元节踩踏汉阳城内的石桥；寒食、端午节荡秋千；四月初八灯夕赏灯等。

## 參考文獻

- (五代) 王仁裕, 《开元天宝遗事十种》,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5年。
- (宋) 王辟之, 《澠水燕谈录》, 北京: 中华书局, 1997年。
- (宋) 周密, 《梦梁录·武林旧事》, 济南: 山东友谊出版社, 2001年。
- (高丽) 李齐贤, 《栢翁稗说》, 首尔: 乙酉文化社, 1978年。
- (朝鲜) 金宗直, 《青丘风雅》, 首尔: 以會文化社, 2000年。
- (法) 达尼埃尔-亨利·巴柔著, 孟华译: 《比较文学意义上的形象学》, 《中国比较文学》1998年, 第4期。
- (韩) 金甲起, 《詩品格論으로서의 正宗·大家論》, 《한국문학연구》第34輯, 동국대학교 한국문학연구소, 2008年。
- (韩) 金镇英, 金东健, 《牧隱 李穡의 삶과 시세계의 몇 국면》, 《国语国文学》150輯, 국어국문학회, 2008年。
- (韩) 吕运弼, 《林椿 生涯에 대한 再檢討》, 《韩国汉诗研究》第4号, 한국한시학회, 1996年。
- 柳己洙, 《李齐贤及其词之研究》, 香港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1991年。
- 李黄振, 《崔致远出生年份及其及第年龄再考论》, 《铜仁学院学报》第13卷第1期, 2011年1月。
- 孟华, 《比较文学形象学》, 中国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年, 第120页。
- 苗威, 《高句丽“平壤城”考》,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26卷第2輯, 2011年4月。
- (韩) 朴宣映, 《세시복식(歲時服飾)의 의미와 상징에 관한 연구》, 中央大学大学院衣类学科韩国服饰专攻博士学位论文, 2012年2月。
- (韩) 朴性奎, 《李奎報 年譜 研究(2)》, 《漢文教育研究》第24号, 한국한문교육학회, 2005年。
- (韩) 朴宗基, 《李奎報의 生涯와 著述 傾向》, 《한국학논총》19卷, 국민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 1997年。
- (法) 让-马克·莫哈著, 孟华译: 《试论文学形象的研究史及方法论(续)》,

《中国比较文学》1995年第2期。

(韩)成范重,《楊若齋 金九容의 文學世界》,蔚山:울산대학교출판부,1998年。

宋再新,《千年唐诗缘:唐诗在日本》,银川:宁夏人民出版社,2005年。

杨琳,《中国传统节日文化》,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6月。

韦旭升,《崔致远居唐宦途时期足迹考述》,《延边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

(韩)郑埜谟,《고려 중기 東人意識의 형성과 詩文選集의 편찬》,《東洋漢文學研究》第36輯,동양한문학회,2013年2月。

(韩)郑埜谟,《北宋使行을 통해서 본 朴寅亮의 문학사적 위상》,《韓國漢文學研究》第46輯,한국한문학회,2010年12月。

(韩)赵东一,《东亚文明论》,首尔:지식산업사,2010年。

陈惇,刘象愚等,《比较文学》,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7月。

韩养民,郭兴文,《中国古代节日风俗》,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年9月。

叶绪民,朱宝荣,王锡明,《比较文学理论与实践》,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4年10月。

Abstract

## The “Chang’an Image” in Korean–Chinese Poetry

Liu-Zhifeng

As everyone knows, Chang’an(長安) was the capital of Chinese Tang Dynasty, and there was a big deal of the Tang Dynasty Poetry about this city. With the power of poetry concerning the city, Chang’an was not just a simple place, but also a place with an image in literary concept. Meanwhile, it was very common to have Chinese poetry about Chang’an appeared in Korea and Japan in ancient times. After survey though the Korean–Chinese poems of Unified Silla, Goryeo and Joseon, Based on researches, within the period when Silla, Goryeo and Joseon, the poems related to Chang’an reached 3,000. Even though the meaning of Chagn’an had been changed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 word “Chang’an” has become a symbol of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which still arouses sympathy at present.

Therefore, the author proposes the concept of “Chang’an image”, namely, in the East Asian civilization circle, form the source of Chang’an image—the capital of Han and Tang Dynasty, some other countries’ cities accepted and recreated a series of landscape, life style, customs and other literary images related. Finally, a broad sense Chang’an image has formed, among which contains a deep East Asian culture emotion.

This article aims at figuring out the implication of Chang’an and Chang’an Image, according to the historical sequence to unify Silla, Goryeo and Joseon respectively.

Actually in the period of Silla unification, poetry works of Chang’an were not that many, representative of which are “The poem to Yu-Shenwei Executive at Chang’an Hostel”(Choe-Jiwon 최치원), “Chang’an spring feeling”(Choe-Gwangoil 최광유), etc. In these works, “Chang’an” referred to the capital city of Tang Dynasty. Poets in this period rarely employed direct description, instead, they were mainly wrote poems replying other Tang Dynasty poets. The reason for the

occurrence of this phenomenon are, on one hand, dissipation of a large amount of works, on the other hand, the social needs of poets in Tang Dynasty.

In Goryeo period, the main poets of Chang'an poetry are Im-Chun(임춘), Li-Kyubo(이규보), Li-Jehyeon(이제현), Li-Gog(이곡), Li-Saeg(이색), Kim-Guyong(김구용), all of who had never been to China except Li-Jehyeon, based on the investigation. As a result, mostly, Chang'an in their works was no longer the capital city of Tang Dynasty but Gaegyeong(개경), the capital of Goryeo. In author's opinion, the main reason for this change lies i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Goryeo and the demise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in spite that Goryeo pledged loyalty to Jin Dynasty. However in the aspect of culture, Goryeo inherited what it had in North Song Dynasty, and strengthened their consciousness as the successor of Chinese culture,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creation of Chinese Poetry. A typical example would be the usage of Chang'an as the name of the capital city of Goryeo.

In most of the Chinese poems in Joseon period, Chang'an referred to Hanyang, the capital of Joseon. In this period, the number of poetry works increased significantly, reaching the amount of more than 2,800. This may result from the plentiful documented materials during a long period of Joseon dynasty, as well as the highly praised Tang poetry in the same period. Almost all of the eminent writers, poets of Joseon had created Chang'an Poetry. Chinese poetry in Joseon period carried forward those in Goryeo period, in both quantity and quality.

Generally, image in imagology have 3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passiveness, stylization, and deviation. Specifically, the Chang'an image of Korean Chinese Poetry reflects 2 major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receptivity and deviation.

By receptivity, it means that Chang'an image in Korean-Chinese poetry is the reception and recreation of that in Chinese poetry, but not dominated by the "self" culture. Instead, factors from outside environment, such as the Chang'an image and expression rule in Chinese Tang poetry,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in Korean-Chinese poetry. This is mainly reflected in the flexible usage of vocabulary and verse allusions of Tang poetry. The author have classified the Chang'an image of Korean-Chinese Poetry into 4 categories—that related to the Chang'an city, that related to the Chang'an landscape, that related to the Chang'an social class(aristocracy & swordsmen), and that related to the Chang'an literary emotions.

Deviation indicates the divergence from the real Chinese Chang'an. This divergence resulted from the misunderstanding brought by the reconstruction of Chang'an image in Korean-Chinese poetry, since they are not just reproduction, but also integrated with patterns and styles in Korean culture. Meanwhile, Chang'an image had been accepted as domestic by the Goryeo and Joseon poets, which means that the Chang'an image of Korean can reflect the image of Gaegyeong and Hanyang more exactly. Therefore, this "deviation" can also be regarded as the characteristic of Chang'an image in Korean-Chinese poetry, and this image is expressed in the depiction of various festivals, since customs and festivals are the reflection of lifestyle and way of thinking of a certain nationality. For instance, people exchange peach wood (to against evil) and dress children in five-color clothes in Spring Festival, stamp on the stone bridge in Hanyang city on Lantern Festival, swing on Cold Food Festival and Tano Festival, and admire lanterns on April eighth, etc.

Key words : Chang'an City, Chang'an image, Korean-Chinese Poetry, Imagology, Goryeo Festival customs, Verse allusions

투 고 일 : 2013. 07. 08. / 심 사 일 : 2013. 10. 20.~ 2013. 10. 27. / 게재확정일 : 2013. 10. 28.